

【论 文】

从“效法美国”到“继承王道”：孙中山 “国族主义”源起与异变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一）

熊芳亮

孙中山对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所谓“美国模式”）有着十分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模式”对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主要倡导依托“政治化”、“美国化”进行“国族构建”；而后阶段则主要倡导依托“文化化”、“传统化”进行“国族构建”。“国族主义”是分辨孙中山“旧”的“民族主义”与“新”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受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虽然蒋介石集团曾试图将孙中山先生描绘成“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¹和“继往开来的圣哲”²，鼓吹“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³，但这不过是为其伪篡、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而行的障眼手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⁴。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师法美国”、学习借鉴美国经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和政治家。而另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史实是，因在抗战期间发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而享有盛誉的顾颉刚，不仅自觉参照“美国经验”来寻求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对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思想推崇备至，明确希望“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⁵。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尚待明晰：所谓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对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孙中山“新民族主义”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间存在怎样的历史渊源或理论关联？鉴于学界（主要是民族学界）长期以来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两者之间如果真的存在直接、重大的历史关联，这种理论误判和认知错觉又是怎么发生的？

除此之外，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孙中山与顾颉刚对于“美国模式”的学习借鉴，对中国当代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学习借鉴“美国模式”的历史经验，又有怎样的启示和启迪值得当今学界深思？

一、“以美国为榜样”：孙中山“国族主义”理论的早期构建

¹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²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³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⁴ 参见熊芳亮：《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时期的民族政治》（一～三），中国民族报，2012年12月14日、12月21日，2013年1月4日。

⁵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1919年，先后经历二次革命（1913）、第一次护法革命（1917）失败的孙中山，再次著书立说系统阐述其“三民主义”。此一时期的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仅与辛亥革命之前所主张的“驱除鞑虏”、“汉满分治”、“光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为不同，而且对于辛亥革命后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也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和否定。以1919年的《三民主义》为标志，孙中山开始构建其“国族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具有非常鲜明的“美国色彩”，几乎处处都以美国为学习的模范和镜鉴的对象。在孙中山看来，不仅“美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光荣”¹、“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的民族²，而且“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是“最文明高尚”的“民族主义”³，是“极好底先例”⁴，明确主张中国“应以美国为榜样”⁵，“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⁶

通过归纳、综合孙中山论述，不难发现孙中山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一）“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政治（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之范围”，有的根源于血统、宗教，有的根源于历史、习俗，有的根源于语言文字，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则“以意志为归”。瑞士和美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孙中山看来，瑞士“合日耳曼、以大利、法兰西三国人民”“组合而建立”，虽然“三者各有（不同的）血统、历史、语言”，但能“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一瑞士之民族”⁷；美国“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⁸，关键在于瑞、美两国的民主政治极为发达，是“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国内底政治既民族底结合”⁹，从而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又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民族”。

（二）“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融合（种族熔炉）”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自美国国家成立，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参加入他底组织中”，美国“为世界各民族最多底集合体”¹⁰；而“美利坚民族”就是“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同时“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¹¹，最终“合英、荷、法、德种人

¹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5页。

²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³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⁴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475页。

⁵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页。

⁶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页。

⁷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⁸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⁹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475页。

¹⁰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475页。

¹¹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同化于美而成底名词”¹。

（三）“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国家”（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对于美国、瑞士实现“国内底政治既民族底结合”的“直接民权”推崇备至²。孙中山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混合”“条顿、斯拉夫、日耳曼等各具特性”的“数十种之民族以成国”，在于其能“以国家之关系”，“吸取各族之善性”，“使（各民族）各自忘其为条顿、为斯拉夫、为日耳曼”，从而形成“以国家为基础之新民族”³；瑞士之所以能够“立国于意、法、德、奥之间”，在于“瑞士为政治制度最良好之国家”，能够以“以政治之方法，调治各民族”，从而成为“一极优美之瑞士民族”⁴。也就是说，“国家”和“政治”是“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根基。

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基本上按照他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的上述认知和理解，对其旧“民族主义”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和改造。

一是把“民族”的内涵，从“汉族”扩大到包括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基础的，满、蒙等少数民族是“民族革命”的对象和敌人，是要“驱除”的“鞑虏”，这一时期的“民族”的概念与基于血缘、文化、语言等因素的“民族”概念相等同。而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则认为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主张“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应当“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补以成一中华民族”⁵，其“民族”定义已经超越血缘、语言、文化等因素的边界，成为包含全体中国人的、公民意义上的“国族”。

二是把“民族主义”的目标，从“满汉分治”调整为实现“民族融合”。孙中山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汉人独立”，“光复中华”，“以明时直省为根本”⁶建立中华民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治主义”或“分裂主义”。但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治”⁷，“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目标，并且直到“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民族主义乃为完了”⁸。

三是把“民族主义”的实现基础，与“民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紧密结合起来。1921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将其“三民主义”思想与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著名演说——“*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等同起来，认为林肯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经典翻译正是出自孙中山的手笔⁹）就是他所创建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¹⁰，明确赋予“民族”以“人民”（*the people*）、“民族主义”以“民有”（*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的政治内涵和鲜明特征。与之相对应，孙中山在强调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同化少数民族的同时，亦

¹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页。

²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475页。

³ 《民国日报》1923年3月19日。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⁴ 《民国日报》1923年3月19日。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⁵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⁶ 太炎（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期（1907年7月）。转引自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8页。

⁷ 《民国日报》1923年3月19日。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⁸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5页。

⁹ 李敖认为应当译为：“为人民服务的”、“被人民选出的”、“治理人民的”政府。李敖：《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22页。

¹⁰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5页。

强调要保障“其他民族”与汉族一起“组织建国底机会”¹，显示他同样重视“民主政治”和“国家”在融洽民族关系、构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作用。

二、“国家”与“王道”：孙中山“国族主义”后期建构的理论异变

1923年前后，经过多次接触与谈判，孙中山与苏俄达成了政治协议，形成了战略同盟。此后，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再次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

（一）不再提及“以美国为榜样”的态度和立场，转而强调和突出儒家思想传统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孙、苏结盟之前相比，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还是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孙中山1923年后基本上不再提及或突出“美国榜样”的地位和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传统思想传统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则显著增强。1924年，孙中山在其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公开宣称“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²；强调要“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就要“善用”中国“固有的旧团体”，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固有的智能”、“固有的能力”等等“先恢复起来”³。孙中山此时所谓的“固有的旧团体”，就是“家族和宗教团体”；所谓的“固有的旧道德”，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所谓“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所谓的“固有的智能”，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⁴。按照孙中山此时的设想，中国“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的“恢复”，是以上述诸般“国粹”的恢复为前提的⁵。

（二）不再提及“共同意志”意义上的“国族”或“民族”概念，重新强调和突出所谓自然力（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在“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1920年后的孙中山，以为“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是“以意志为归”的。但在1924年前后，尤其是与苏俄结盟之后，孙中山对他曾经推崇备至的“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闭口不提，反而在宣称“民族”就是“国族”的同时，强调“民族”是由自然力（包括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造成”的，重新回归到以血缘、宗教、历史、习俗、语言等基础和归宿的、并不是“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认为在“造成”“民族”的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自然力”⁶。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这一转变，是其“国族”、“中华民族”概念和内涵的严重倒退，不仅此前“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的态度悄然不见，甚至连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都被忽略不计——在明知中国还有“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的情况下，孙中山仍认为“四万万中国人”是“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⁷。在几年之前，孙中山还曾主张要把“中国所有

¹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页。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页。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页。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0页。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0页。

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188页。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8页。



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短短几年之后，这一目标突然变成了一种“现实状态”。

（三）不再提及“民主政治”、“国家政治”在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转而强调和突出所谓的“王道”和“民族精神”。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实现，是以“民权主义”为基础的，正是因为美国、瑞士实行直接民主、民权发达，才能消弭社会分歧，形成“共同意志”，从而凝聚语言、文化、宗教都不相同的各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但在1924年前后，孙中山转而突出“国家”与“民族”的区别，并否定“国家”在“民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孙中山认为，认为“国家”是“用霸道造成的团体”，是“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民族是“用王道造成的团体”，是“自然力结合而成的”，“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区别”¹。而孙中山所谓的“王道”，就是要恢复“旧道德”、“旧智能”、“旧能力”，利用“旧团体”……。孙中山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是以“恢复”“民族精神”为主要目标进行建构的：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实行古代中国的“王道政治”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不仅“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与“民主政治”、“国家政治”无关，而且孙中山同期在其关于“民权主义”的论述中，也没有通过建立民主政治以消弭各族分歧、凝聚各族“共同意志”的内容。也就是说，所谓“王道”割裂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共生关系，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综上所述，孙中山“国族主义”或“新”的“民族主义”经历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不仅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参照体系，甚至连最基本的理论概念都大相径庭：

在前一个阶段是以美国、瑞士经验为参照标准，主张“以美国为榜样”构建超越血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界线而成一“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是跨文化、跨血统、跨种族的“国民”意义上的“政治国族”。在后一个阶段则是以“儒家”传统为参照标准，主张以所谓“王道政治”恢复“旧道德”、依靠“旧组织”、传承“旧文化”凝聚“四万万人为一体共同奋斗”构建“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却是以一种文化，即儒家文化构建而成的“文化国族”。尽管如此，两个阶段的“国族主义”仍然有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²的思想，以及“凝聚四万万人的力量”，构建“一个中华民族”的目标得以保留和延续。

由上可以看出，孙中山对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所谓“美国模式”）有着十分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模式”对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在对待“美国模式”实际上显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孙中山强调“政治”在“美国民族”形成中的主要作用，认为“美国民族”是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在其“国族主义”学说中，继续使用基于血统、文化、语言、习俗等因素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凸显“同化”、“种族融合”的作用。“国族主义”是区分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与“旧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反帝国主义”只是孙中山“国族主义”构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核心。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构建，早期构建阶段主要倡导依托“政治化”、“美国化”进行“国族构建”；而后期构建阶段则主要倡导依托“文化化”、“传统化”进行“国族构建”。

继承孙中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渊源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二）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6—187页。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页。



熊芳亮

新中国成立初期，顾颉刚曾深刻剖析自己的性格缺点，称自己一直在“治经”与“救国”的双重抱负之间徘徊挣扎。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实际上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也就是说，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

顾颉刚¹出生书香门第，家学深厚，学识卓著。他曾自述其学术渊源，称郑樵、姚际恒、崔述给他“疑古的思想”²，梁启超与章太炎给他“批评的精神”，胡适给他“整理的方法”，钱玄同给他“研究的题目”³。但笔者以为，此就专指其“治经”（做学问）的方面而言。顾颉刚曾回顾其前半生（1949年前），称自己一直在“治经”与“救国”之间徘徊不定：少年时受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满心想救国”；青年时受章太炎、刘申叔的吸引“立志想治经”；辛亥革命后参加中国社会党想实现“社会主义”；大学时代“死心塌地走向‘整理国故’”；九一八事变后“又大动了一下”想“救国”；直到“对国民党无希望”了，最后“又投进商界去了”⁴。顾颉刚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则仍（有）缘作了几次旅行”⁵。所谓“研究古史”，是指顾颉刚曾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组织禹贡学会、编辑《禹贡》学刊，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研究中自然会涉及到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所谓“旅行”，是指顾颉刚曾于1932年考察内蒙自治运动，陪同南京国民政府代内政部长黄绍竑赴乌兰察布盟“宣慰”德王，以及抗战初期考察西北教育“游历”甘、青两省，深感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无能及其巨大危害。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化图谋，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刺激，促使顾颉刚改变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最初认识和看法⁶。

从顾颉刚对“边疆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将之视为其“整理国故”、“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之后的“第三个方面的事业”⁷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了“治经”与“救国”的结合点。孙中山的学说曾经给予少年顾颉刚以“救国”的理想，顾颉刚坦诚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认为“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是“惟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⁸。根据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在发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之前，顾颉刚阅读

¹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本科毕业，在求学期间即在民俗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毕业不久即开创了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组织或参与了禹贡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主编或参与了《禹贡》、《边疆周刊》、《歌谣周刊》等多种报、刊，先后参加中国社会党（1912-1913）、中国国民党（1936-1942）等党团组织，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黄绍竑、朱家骅、叶圣陶等民国政要、学界名流有密切往来。

²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79年3月-1980年9月）。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9-174页。

³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作。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3页。

⁴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8页。

⁵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作。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4-373页。

⁶ 顾颉刚：《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年10月14日。

⁷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1页。

⁸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



了大量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著作，其中包括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1937）、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28）、罗家伦的《新民族观》（1936）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至少曾在1934年8月至9月（游历内蒙之后）¹、1938年12月（考察西北之后）专门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²。在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论著中，顾颉刚不仅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推崇备至，而且多次直接引用、引述孙中山的观点，并且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³为己任。既然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学说在顾颉刚的“救国”思想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我们显然有必要追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底是顾颉刚的“原创”，抑或是受到孙中山“国族主义”或其他理论、思想所启发，并与之相互砥砺的结果？

表：顾颉刚引用孙中山“民族主义”著述的情况（部分）

引用篇目	文章及日期	具体内容
《三民主义》（第一讲）（1924）	《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1939年5月）	（一）“美国人的种族比那一国都要复杂……。”（二）“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三）“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1939年5月）	“必要使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建国大纲》	《内蒙巡视报告》（1934年10日）（代内政部长黄绍竑起草）	“国内各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
《国民党一大宣言》	《内蒙巡视报告》（1934年10日）（代内政部长黄绍竑起草）	（孙中山）郑重声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通过对比顾颉刚与孙中山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与孙中山“国族主义”的早期构建思想基本一致，可谓一脉相承。

第一，顾颉刚所使用的“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与孙中山所使用的“国族”概念基本等同。顾颉刚认为，“体质、语言和文化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就是“团结的情绪”⁴；“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乃是一国国民彼此间的情感和相互的同情心，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种不同的人民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⁵，使其“民族”的概念成为“有组织的人民”，拥有“公民”、“国民”的意义。这一概念与孙中山早期的“国族”概念基本等同。顾颉刚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第一讲虽然采用了欧美学者的旧解释，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项，但他很明白中国的国情，很清楚中国的历史，他毅然决然地说：‘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一个意思，我觉得非常对”⁶。

第383页。

¹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8、2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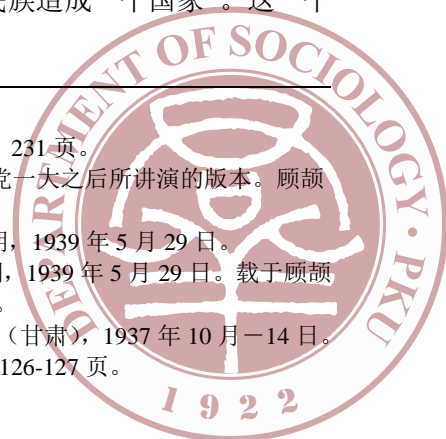
² 具体版本不详。不过从顾颉刚引用的情况来看，应当是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所讲演的版本。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4页。

³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⁴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126页。

⁵ 顾颉刚：《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年10月—14日。

⁶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6-127页。



第二，“国家”、“政治”在顾颉刚所设想的“国族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顾颉刚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所造成的心理现象”，民族“是凭了人民的意志所造成的”¹；“明明是二个不同的种族，明明是很有仇恨历史的二个种族，但只要能一起生活於一个政府之下，彼此就都是一家人”²。顾颉刚反对那种将 nation 与 state、与政治截然分离的看法，称：“现在一班人都以为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般人民所形成的一个团体是 state，应译为‘国家’；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班人民是 nation，应译为‘民族’”，“这个解释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state 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nation 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它和 State 是一样的含有政治意义”³。正因如此，顾颉刚所设想的“国族”构建，是以民权、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政权公开给全国人民，共同组织一个政府”，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每个国民对于国家都有了他的一分责任”⁴。

第三，否定“五族”，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是以否定“五族共和”为政治基础的。“国族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构建“一个国族意义上的民族”。1920年代前后，孙中山在提出“国族主义”的同时多次批判“五族共和”，称“五族共和”是“无知妄作者”所“创办”⁵，是“欺人之语”⁶，主张“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⁷。顾颉刚继承了孙中山反对“五族”的思想，强调“中国并无五族之分”⁸，“‘五大民族’这名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⁹，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¹⁰。也就是说，孙中山把“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正是顾颉刚“中国的版图内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观点的思想前奏和理论先声。

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推崇备至，以致于达到“心悦诚服到极度”的程度，自然无法容忍蒋介石集团伪摹、歪曲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的观点和行径。

第一，顾颉刚对戴季陶以“道统论”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批判。蒋介石集团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曾试图将孙中山先生描绘成“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¹¹和“继往开来的圣哲”¹²，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¹³，鼓吹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¹⁴。对此顾颉刚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称“道

¹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126页。

²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9-110页。

³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⁴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2-163页。

⁵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

⁶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

⁷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5页。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否定“五族共和”，并不是否定“共和”，而是否定“五族”。

⁸ 顾颉刚：《边疆问题》，1938年9月4日在甘肃学院讲演。蔡心鉴笔记。《甘院学生》第8卷第1期，1938年12月15日。

⁹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3-1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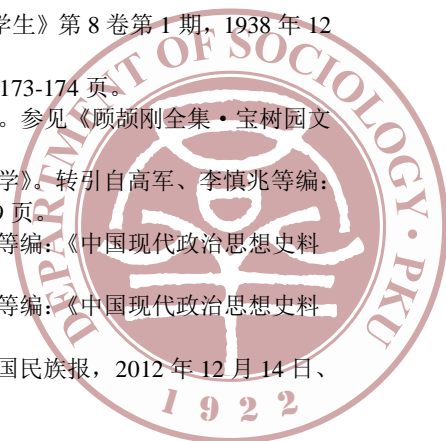
¹⁰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¹¹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¹²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¹³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¹⁴ 参见熊芳亮：《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时期的民族政治》（一～三），中国民族报，2012年12月14日、



统”不过“是伦理的偶像”。在顾颉刚看来“道统说”“一无可取”，不仅“尧舜”存在与否本就“可疑”，而且孔、孟之道亦不相同——“孔子称美管、晏而孟子羞道之”，“孔子崇霸业而孟子崇王道”，但是“道统说的影响”却“使后人感到古圣贤有一贯的思想，永远不变的学说”，反而“密密地维护，高高地镇压，既不许疑，亦不敢疑”，反倒已经“成为各种革新的阻碍”¹。

第二，顾颉刚对戴季陶所提出的“同源同祖”论、“文化同化”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批判。戴季陶曾鼓吹中国各民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²；“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³。顾颉刚对这些观点颇不以为然，指斥戴季陶所谓的“同出一祖”是“欺人”的“空言”，“尝使（中华民族）藉欺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⁴在顾颉刚看来，“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⁵；“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能称之为‘汉人的文化’”⁶。顾颉刚批评蒋介石集团试图“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强调“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只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他们增加知识技能，享受现代的生活，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公民，一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分子，“决不是想要消灭”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⁷。

第三，顾颉刚对戴季陶所鼓吹的“放任主义”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批判。在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之下，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幻想通过“修王道”来“柔远人”；另一方面又将蒙藏等“边疆地区”视为“不毛之地”，“皮外之伤”，对于蒙、藏的分离运动和前途命运听之任之，辩称“在今日情势之下，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⁸，声称“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业”，“穷人作穷人之打算”，公然宣称不能“为边疆离析而为种种保存体面之徒劳无益的努力”⁹。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放任主义”态度深恶痛绝，指斥所谓“修王德”、“行王道”只是一种“没办法”的“玄想”；对于“边疆地区”“哪里出问题就哪里放弃”的“放任主义”更是“不对的”¹⁰；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性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¹¹，“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¹²；警告以汉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想法“只是填鸭子”、“揠苗助长”，“做得好是种了不生根的草，做得坏那竟是漫山遍野放了一把恶火”¹³；并且直白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抚大员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是横暴之极”，逼得边疆人民“走投无路”¹⁴，可谓针针见血，至今读来依然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顾颉刚的书生意气和政治

12月21日，2013年1月4日。

¹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1933年3月）。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四册），朴社出版社。

²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

³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⁴ 顾颉刚：《三皇考·自序》（1936）。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页。

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6页。

⁶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7页。

⁷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⁸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93—195页。

⁹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98—99页。

¹⁰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176页。

¹¹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42页。

¹²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¹³ 顾颉刚：《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1938年1月）。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3页。

¹⁴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4页。



勇气。

顾颉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而且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

第一，在超越以血统、语言、文化、习俗等因素为基础的“民族”，构建“人民”、“国民”意义上的“国族”方面，顾颉刚比孙中山更加坚定、彻底。孙中山虽然是“国族主义”的首倡者，但是他的“国族主义”受到多重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国族”的早期构建阶段，孙中山的“国族”概念就是“人民”、“国民”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与民权、民主政治直接相关，但是到了“国族”的后期构建阶段，孙中山的“国族”概念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回到了血统、语言、文化、习俗等因素为基础的“民族”概念之上，试图以小“民族”来构建大“国族”，无疑于理论上的倒退和反复。而顾颉刚在“国族”概念的定义上显然比孙中山更加坚定、彻底、清晰，诸如“一国的国民”、“有组织的人民”、“政治现象”、“团结的情绪”等内涵，赋予了“国族”、“中华民族”以更加明确、丰富、完整的意义。

第二，顾颉刚对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准确。孙中山的“国族”构建，是建立在列强压迫和“四万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对于“国族主义”的构建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需要，并没有深入分析蒙、藏分离运动源起的历史原因。而作为史学家的顾颉刚，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顾颉刚认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存在两大根源，就历史方面而言，在于清朝政府的分化政策。清朝“对各族采分裂政策，使各族力量互消，以减少对满族的反抗”¹，例如“用文化政策牢笼汉人”，“用愚禁政策羁縻蒙藏”，“用残杀政策削弱回人”，造成“同一国家内本当休戚相关的诸民族便互相漠视或仇视”，“一旦帝国主义者侵入我们的边疆，问题便出来了”²。就现实方面而言，在外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分化瓦解图谋；在内的原因就是边疆官、商“为虎作伥”，为官的只想剥削边民发财，为商的也是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导致边疆地区面临“强邻环攻于外，边民离心于内”“的莫大危机”³。对顾颉刚而言，“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构建，不仅是现实主义的需要，而且也是历史性的必然。

第三，顾颉刚较为系统地研究和提出了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孙中山的“国族主义”，除了提出要“同化”、“融合”少数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之外，并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方案。相比较而言，顾颉刚拟定的政策更为系统、具体，主要包含训练边疆（民族）调查人才；发展交通；振兴实业；清除疾病；普及教育；公平交易；清除外国传教士；文化交流；通婚等九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内容⁴。

由于顾颉刚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国族主义”学说的影响，而且继承和完善了孙中山“国族主义”思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古代中国史专家的顾颉刚，为什么会为美国处理种族或民族问题的经验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和立场。顾颉刚在其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文章中，虽然未像孙中山那样明确主张“以美国为榜样”或“学习美国经验”，但也多次参照或依据美国的经验和做法以论证或支持其观点，称“中国虽是种族（血统）和文化（风俗习惯）很复杂的一个国家，而绝不妨碍其为一个民族，正同美国一样”⁵。鉴于顾颉刚并没有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或民族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⁶，且其对于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越孙中山的范畴，我

¹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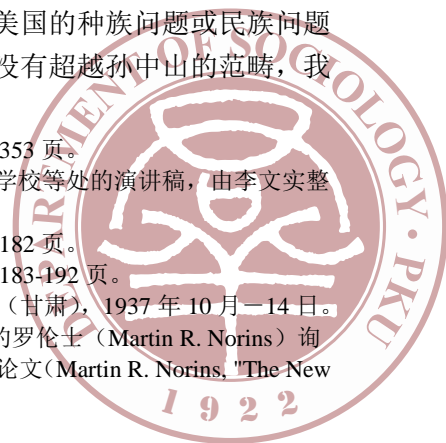
² 《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1942年9月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处的演讲稿，由李文实整理）。

³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2页。

⁴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3-192页。

⁵ 顾颉刚：《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年10月14日。

⁶ 根据顾颉刚日记的记载，顾颉刚1940年4月甚至曾向从美国来华做博士论文的罗伦士（Martin R. Norins）询问中国的边疆外交问题。罗伦士曾著有题为《新疆——中国与中东的连接点》的论文（Martin R. Norins, "The New



们有理由认定顾颉刚关于美国的基本认识正是来自于孙中山。顾颉刚在其文章中亦曾坦承这一点：

“旧日的学者往往把血统相同作为构成民族的条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美国人的种族比那一国都要复杂，各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国之后就溶化起来，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自成为一种民族。这种民族既不是原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欧洲人，另外是一种新民族，可以叫作美利坚民族。美国固有独立的民族，所以变成了世界上独立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血统的分歧并不能阻碍民族的统一，美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¹

孙中山与美国：幻想破灭及其对国族主义的影响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美国政府对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冷漠、傲慢与决绝，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支持、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幻想，同时在其“三民主义”学说，包括“国族主义”构建中降低甚至消减美国政制和美国模式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不仅知道“国族主义”是分辨孙中山“旧的民族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而且知道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构建：即主要倡导“政治化”、“美国化”的早期构建阶段，和主要倡导“文化化”、“传统化”的后期构建阶段。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构建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理论异变？这种“异变”导致了怎样的理论影响和政治后果？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人民共和创立新中国，而不是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国族主义”？

从孙中山树立革命思想、创立革命团体、形成革命理论、领导革命运动之初，孙中山就一直幻想能获得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理解、支持，以帮助其完成革命的使命、达成革命的目标。美国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直接渊源于西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主张“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²。早在“三民主义”创立之前，孙中山就曾在美国发表演说，宣称要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³，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曾多次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⁵。

其次，从革命力量上来看，美国华人华侨是革命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和经费来源。孙中山的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¹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2页。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3页。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6页。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0页。

